

中国教育研究丛书

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 战略管理研究

卢晓中 等著



The Series of
Chinese Education
Research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教育研究丛书

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 战略管理研究

卢晓中 陈伟 张旺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管理研究 / 卢晓中等著.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1

ISBN 978-7-303-17279-5

I. ①现… II. ①卢… III. ①高等教育—发展战略—研究—中国 IV. ①G64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66481 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5532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

电子邮箱 gaojiao@bnupg.com

XIANDAI GAODENG JIAOYU FAZHAN DE ZHANLÜE
GUANLI YANJIU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 刷: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60 mm×230 mm

印 张: 28.25

字 数: 392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78.00 元

策划编辑: 郭兴举 陈红艳

责任编辑: 郭兴举

美术编辑: 王齐云

装帧设计: 王齐云

责任校对: 李 菡

责任印制: 陈 涛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前言

在以全球化、信息化、高科技为特征的知识经济时代，现代高等教育越来越成为影响和决定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性力量，高等教育作为“社会的中心”和高等院校作为社会“轴心机构”的地位日益彰显。而时代发展又使现代高等教育赖以生存的环境和条件发生了剧烈变化。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环境不断变化，市场需求不断增长，且竞争不断加剧，各国政府纷纷调整其高等教育公共政策，使得高等教育面临来自外部世界越来越大的挑战和压力，常规的管理模式已难以使高等教育系统应对这些挑战和压力，要求运用战略管理对高等教育的外部机遇与威胁、内部优势与劣势进行有效调控，以提高高等教育的反应能力，增强高等教育的核心竞争力。

同时，由于一些组织对战略管理的内涵、理论基础等认识不足，在高等教育战略管理的实践中存在一些误区，如在战略管理中重规划文本轻规划过程、重领导意志轻民主参与、重战略制定轻战略实施与控制，战略目标不明确，战略选择趋同化，急功近利思想严重等。因此，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对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管理进行深入研究都是非常重要的。

战略管理研究是高等教育发展战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其旨趣在于从系统的角度全面研究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构想、战略分析、战略决策、战略规划、战略实施和战略调整等多个彼此联系且又不断深化的内容和步骤，以及从政策操作、组织转型、制度安排等不同角度落实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管理问题。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研究是建立良好战略管理系统的重要保证，而良好战略管理系统的建立又是高等教育承担和履行其职责和使命、提升其竞争能力、寻求和拓展自身生

存机遇和发展空间的基本前提和重要基础。

关于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管理研究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有利于进一步拓展高等教育研究的论域,完善高等教育发展战略的理论研究体系。对于高等教育发展战略的理论体系而言,从单纯注重战略决策研究转换到关注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管理研究,既实现了理论层次的提高,也实现了研究范围的扩大和论题领域的扩张,有助于完善高等教育发展战略的理论体系。

二是有利于发展高等教育学研究及其学科建设。发展教育学研究在我国已经逐渐兴起,发展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正在起步。但其基本范畴尚不规范,研究对象不太明确,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还不成熟。尤其是作为其理论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战略管理的理论研究还相当薄弱。通过本课题的研究,将有助于推动发展高等教育学的研究及其学科建设。

就其实践价值而言,主要体现在确立国家、地区的高等教育发展战略及高等教育机构发展战略的实践意义上。具体包括:通过研制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管理的理论模式和操作框架,为国家层面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管理实践提供参考依据;通过为广东省高等教育的发展建构一系列具备区域文化特色的战略管理框架,来为区域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管理实践提供参考依据;通过以一些院校为研究个案,建构一个高校发展的战略管理模式,来为高等教育机构发展的战略管理实践提供参考依据。此外,本研究还将有助于高等教育发展的实践部门加深对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管理的认识,从而避免在高等教育领域中长期存在的重战略决策、轻战略管理造成的“美妙的空文”局面。

一、研究思路

本研究主要从两个维度展开,一是从理论角度对高等教育发展理论进行研究,目的是为高等教育战略管理寻找理论基础,通过对高等教育战略管理的结构、要素功能和过程的分析,增进对高等教育战略管理的理解,把握高等教育战略管理的方法和策略;二是从实践和应

用的角度对高等教育战略管理系统(政府)、高等院校和学科三个层面的实施进行比较与研究,目的是通过对高等教育战略管理具体实践的分析,结合理论研究,总结各国高等教育战略管理的经验教训,以进一步改进高等教育的战略管理。

二、研究重点

本研究主要涉及以下重要问题: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管理作为高等教育发展的一种新的管理范式,应以什么样的高等教育发展理论为理论基础?如何理解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管理的内涵?它与高等教育常规管理和战略规划的区别是什么?提高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管理的策略是什么?如何对高等教育变革进行战略管理?如何在政府、院校和学科三个层面具体实施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管理?

战略管理最初在私营部门产生并发展起来,而后才扩展到公共领域,因此,无论从历史发展脉络还是理论逻辑看,高等教育战略管理都无法割断与私营部门的战略管理的联系。由于高等教育系统与私营部门有着本质的区别,高等教育战略管理必然不同于私营部门的战略管理,甚至不同于其他公共部门的战略管理。因此,如何在研究中把握高等教育战略管理的特殊性,处理好高等教育战略管理与其他公私部门战略管理之间的继承借鉴与发展创新的关系,继而构建高等教育战略管理的理想模式是本研究亟须突破的重点。

三、内容框架

本书内容分为四部分,分别为导论,即高等教育发展理论与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管理、高等教育系统变革的战略管理、高等院校战略管理和高等院校学科发展的战略管理。第一章“导论”,着重论述对高等教育发展理论的有关认识,以此为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管理确立理论基础。同时对战略管理的相关概念及其区别、战略管理的界定、战略管理的基本特征做出铺垫性的陈述;第二章“高等教育系统变革的战略管理”对高等教育系统变革的战略管理理论做了背景性介绍,引用美国、英国和印度三个具有代表性的国家高等教育系统变革的战略管理

实践与中国高等教育系统发展的战略管理进行比较分析,为我国高等教育系统发展的战略管理总结了经验,指明了方向。第三章“高等院校战略管理”通过回顾高等院校战略管理的背景、概念、发展历程及意义,对高等院校战略管理的核心(战略规划)、高等院校战略管理的关键(战略实施)、高等院校战略管理的保障(战略评估与控制)及高等院校战略管理的利益相关者做了比较充分和系统的研究。第四章“高等院校学科发展的战略管理”则通过理论分析和三个典型案例的分析与评价,对中国高校学科发展的战略管理的成就与问题进行总结,从而提出中国高校学科建设与发展的战略管理策略,以期达到吸收、借鉴、发展并创新的效果。

本书是我主持的广东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大项目“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管理研究”的主要成果,同时也是本人主持的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高等教育发展学”的重要成果。由我提出研究框架和书稿提纲,全书撰写的具体分工如下:第一章导论由我和张旺撰写,第二章由陈伟撰写,第三章由张旺撰写,第四章由陈伟撰写。全书的修改和统稿工作由我负责。

本书的出版,得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尤其是郭兴举首席策划编辑对本书的修改和完善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和建议。本书的撰写还参考和引用了国内外有关作者的研究成果和资料,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由于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促,谬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各位专家批评指正。

卢晓中

2014年8月

目 录

第一章 导 论	1
第二章 高等教育系统变革的战略管理	21
第一节 高等教育系统变革的战略管理理论	23
第二节 国外高等教育系统变革的战略管理	64
第三节 中国高等教育系统发展的战略管理	104
第三章 高等院校战略管理	214
第一节 高等院校发展的战略管理理论	214
第二节 高等院校战略管理的核心：战略规划	230
第三节 高等院校战略管理的关键：战略实施	291
第四节 高等院校战略管理的保障：战略评估与控制	311
第五节 利益相关者与高等院校战略管理	324
第四章 高等院校学科发展的战略管理	338
第一节 学科发展的战略管理理论	339
第二节 学科发展战略管理的国际案例	368
第三节 中国高校学科发展的战略管理	408
参考文献	435

第一章 导论

一、什么是高等教育发展理论

(一) 发展与教育发展理论

对任何一个概念,要给出科学的界定,必须首先明确其所属的科学范畴。因为同一个语词,在不同的科学范畴里所赋予的概念含义并不一致。而“发展”这一语词,作为学科概念,最早出现在胚胎学,即所谓发展,指的是生物胚胎“自然而然”的演变和进化(Evolution)过程。后来遗传学家把“发展”解释为事物渐进过程的“中断”,即事物由旧的形态“飞跃”到新的形态。而在哲学的一般意义上,“发展”则被认为是事物由小到大、由简到繁、由低级到高级、由旧质到新质的运动变化过程。

尽管上述的发展是一个中性词,并没有给出一个价值预设,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发展学里,发展作为一个正面的概念,被寄予了一种以现代价值为预设前提的现代语词,即“发展”指的是以经济增长为基础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结构、体制的演进和变革,特别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化和变迁。^①“发展的最终目标必须是为了个人的福利持续地得到改进,并使所有人都得到好处”。^②“发

^① 庞正红等:《当代社会发展理论新词典》,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页。

^② 肖枫:《西方发展学和拉美的发展理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14页。

展意味着‘良性’的成长与‘可欲’的现代化”。^①与胚胎学的进化相比较，“发展有别于进化之处在于它是有意识的行动。发展是社会、或至少是那些有权代表社会的人们自觉努力的结果”。^②一般来说，有些“进化”只涉及变异，并不包含“向更高形式不断进步”之义。而“发展”则蕴含着一种趋向更“好”目标的方向性含义。

基于发展学的角度来认识和研究教育发展问题有特殊的适切性，因为教育的本质就是发展，不论是人的发展，还是教育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教育自身的发展，始终是着眼于应然的价值预设，无疑是积极、正面的。在有了这样一个基本认识以后，如何从发展学的角度去研究教育发展问题自然就成为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国外发展教育研究兴起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并初步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而在我国，从发展学的角度研究教育发展问题，则发轫于20世纪90年代比较教育学的发展，它是从国际比较的视野，试图从个案国或某一类国家(如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发展，以及教育与国家发展的关系等问题进行探讨。发展教育甚至被认为是当代比较教育学发展的两个重要方向之一。21世纪之初，人们又提出从教育学原理的角度构建发展教育学，^③即从教育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来探究教育发展问题。由此也引发我的思考，也就是如何将比较教育学的角度与教育学原理的角度相联系，来寻求对教育发展问题的正确认识，进而来建构教育发展研究的基本视角。如果说比较教育学为人们认识教育发展问题提供了一个“宽度”，那么教育学原理则为认识教育发展问题提供了一个“深度”，这“深度”和“宽度”两个向度就构成了教育发展研究的基本视角。

在确立了教育发展研究的基本视角以后，如何为发展研究建立一

① 庞正红等：《当代社会发展理论新词典》，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② 伊斯梅尔·萨布里·阿卜杜拉在联合国组织的关于“现代性和个性”的巴黎会议上的发言，载《国际社会科学》中文版第7卷，第1期，第13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③ 江博：《首都师大举起“发展教育学”旗帜》，载《中国教育报》，2002-12-21。

个适当的分析框架,就成为—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在近年来有关教育的发展研究中普遍存在—个问题,就是缺乏—个明晰、合理的分析框架,例如在各种各样的教育发展战略研究中,或是缺乏必要的理论指导,或是没有明确的理念引领。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角度,可以建构以下基本分析框架:发展理论——发展理念——发展实践。而在这一基本分析框架中,发展理论作为发展的理论基础,它是发展实践的理论依据,对发展实践起指导作用。但发展理论对发展实践的引领往往难以直接实现,这里需要通过—个中介,这个中介就是发展理念,发展理念是在—定的发展理论指导下形成的,它实际上是发展主体对发展理论的一种主观认识和态度,对发展实践起直接的引领作用。^①

(二) 基于社会变革视野下高等教育发展理论的创新

作为发展理论的—个重要分支,高等教育发展理论主要是研究高等教育发展与国家、社会发展的关系,以及在这一关系框架下的高等教育自身发展问题。如前所述,它对高等教育发展实践(战略)具有重大的引领和指导作用。

1. 社会变革与高等教育发展理论的关系

世界处在—个大变革时代。社会变革究竟对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有哪些?面对社会变革,高等教育发展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发展理论?这是当前高等教育理论界必须认真回答的问题。要探讨社会变革与高等教育发展理论的关系,必须弄清以下两对关系:—是高等教育发展与社会变革的关系;二是高等教育发展实践与高等教育发展理论的关系。

从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关系而言,高等教育发展总是与社会变革(包括社会危机,变革与危机常常是相关联的,危机中常常预示着变革,而变革往往也是充满着风险)密切相关,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认识:—是

^① 笔者曾提出发展研究的分析框架是:发展理论——发展理念——发展战略,实际上也是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的,发展战略是具有实践性特征的,如果说发展理论是对发展问题、发展实践的感性认识上升到了理性认识,那么发展战略则使发展理论以另—种精确的形式重新走向实践(参见许先春:《走向未来之路——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年版,第35页)。

从“适应论”的角度来看，一种社会变革往往会对高等教育发展提出新需求，它要求高等教育适应这种变革；二是从“引领论”的角度来说，今天高等教育发展愈来愈具有对社会变革的引领功能，也就是说高等教育发展可以在相当程度上促使社会变革，这种“促使”，不仅指高等教育发展可能引起社会变革，更是要主动、自觉地引领社会变革。尤其是当高等教育走向“社会的中心”、高等教育的社会功能日益彰显的情况下，高等教育发展对社会变革的这种“引领”功能正愈加显著。

对于高等教育发展实践与高等教育发展理论的关系，我们同样可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一般意义来认识，即实践是理论发展的源泉，理论引导实践的发展。但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时期的高等教育发展理论对高等教育发展实践的引导作用并不一样。比如，在高等教育发展理论相对贫乏的时代，如欧洲中世纪大学早期，大学的发展实践基本是自发的，很难谈得上有明确的发展理论的指导。所以，人们常常认为早期的中世纪大学的创建和发展是“实践在先、理论在后”。真正的“理论在先、实践在后”则是在19世纪以后，尤其是1809年德国柏林大学的创建与发展，从一开始便有了明确的办学理念。进入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现代高等教育逐渐进入“社会的中心”，高等院校成为社会的“轴心机构”，高等教育发展对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愈来愈重要，而且无论是高等教育自身的运作，还是服务的对象，都变得日益复杂和多样，这就使得高等教育发展理论对高等教育发展实践的先导作用愈加明显。一个国家和地区有没有正确的高等教育发展理论，对这个国家和地区的高等教育发展至关重要；同样，一个高等教育机构有没有正确的高等教育发展理论，直接关系到这个高等教育机构的生存。这也是当前在世界范围内重视探索高等教育发展理论的重要缘由。1998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的首次世界高等教育大会，实际上就是世界范围内的一次高等教育发展理论的大讨论，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级官员季米特里·别里泽所说的，“这次会议也将因此成为‘地球村’新大学的‘思想实验室’”。^①事实证明，这次世界高等教育大

^① 季米特里·别里泽：《高等教育学历和资格的承认：21世纪的挑战》，载《教育展望》(中文版)，1999年，第3期。

会给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实践带来的影响是广泛和深远的。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理论对高等教育发展实践的影响,从有关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对近十年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进程的影响可见一斑,尽管这种影响未必都是积极的,甚至也出现过由于对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误读而导致某些实践的误区。

正是以上两种关系,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社会变革与高等教育发展理论的关系,即高等教育发展理论通过引领高等教育发展实践,以适应社会变革甚或引领社会变革;而同时高等教育发展理论在这一过程中也不断得到丰富和创新。

20 世纪后半叶出现的较有代表性的高等教育发展理论,^①如马丁·特罗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论”、本·戴维的“学术中心论”、阿什比的“遗传环境论”、克拉克·克尔的“高等教育论”及天野郁夫的“高等教育制度类型论”等理论,也都是因应剧烈的社会变革引起的高等教育大变革、大发展而产生的。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国都处在一个大变革、大发展时期,社会变革既对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了要求和机遇,又使高等教育发展面临许多挑战和危机。比如,这一时期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发展迅猛,集中表现在规模迅速扩大,数量增长显著,但同时又面临着深刻的危机,似乎大学的管理、经营、财政、课程、教师录用及培养、学生选拔、科研资助、师生关系等所有方面都出现了问题,都在等待高等教育来一个质的变化。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特罗论述了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的普遍趋势和规律,阐明了数量与质量的辩证关系,并指出了高等教育阶段转移时必然出现的矛盾及必须解决的问题;戴维告诉人们世界学术中心是不断变化的,伴随着这种学术中心的转移,实际上大学教育引导着这一转移,学术中心国家的大学模式又影响着世界各国大学模式;阿什比则用比较生态学的方法通过研究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历程,提出了大学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并从大学发展动力的角度阐述了大学与政府、社会的关系,以及科技革命与大学教育变革的关系;克尔从历史的角度阐述了各种大学观与社会变革的关系,

^① 史朝:《国际高等教育发展理论述评(上、下)》,载《外国教育研究》,1998年,第6,7期。

提出了面对社会变革的“多元化巨型大学观”；天野郁夫提出了高等教育的阶级结构、教育结构和职业结构“三种结构论”、日本高等教育的“二元二质结构”“高等教育制度类型论”。

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上每一次重大的社会变革常常也意味着认识论及方法论上的大发展、大突破，而且这种大发展、大突破往往具有普适意义，对于高等教育发展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如当代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剧烈变革和重大转型的关键时期，高等教育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新时期中国高等教育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那么，如何确立适恰的高等教育发展理论为中国高等教育提供理论引领？近年来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包容性增长作为新的发展观，无疑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理论提供了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指引。

2. 新时期高等教育发展究竟需要什么样的高等教育发展理论

面对新时期社会变革和转型，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理论亟须创新。

高等教育发展理论的创新应当重视引领社会变革，从“高等教育适应论”视角到“高等教育引领论”视角

如果说以往的高等教育发展理论更多的是回应社会变革对高等教育发展提出的新需求，呈现出明显的“适应性”特征，那么，在新时期，随着高等教育日益进入“社会的中心”和高等教育在国家发展和人的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彰显，高等教育发展理论应充分发挥对高等教育发展的引导作用，并通过这一引导作用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引领社会变革。

高等学校的社会职能是一个历史范畴，正如克尔所认为的“高等教育的漫长历史，包括一个从少数职能到很多职能的延续几个世纪的运动，最初缓缓地增加，但是比较新近，迅速地增加”。^①今天的高等学校，除了人才培养、发展科学和直接为社会服务三大社会职能外，还理应承担起促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引领社会变革的社会职能。正如2009年世界高等教育大会公报“高等教育与研究在促进社会变革和发展中的新动力”所指出的：“面对当前和未来错综复杂的全球挑战，高

^① 克拉克·克尔：《高等教育不能回避历史》，王承绪等译，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63页。

等教育的社会责任就是帮助我们提高对涉及社会、经济、科学和文化等方面复杂问题的认识能力和应对能力。高等教育应当引领社会在应对全球性的挑战,特别是在食品安全、气候变化、水资源管理、跨文化对话、可再生能源和公共卫生等方面形成一种全球性的认识”。^①胡锦涛同志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上提出高等学校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四个必须”,其中包括要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必须大力推进文化传承创新”。所谓“文化创新”,实际上提出了高等学校促进和引领文化变革与发展这一重要问题,应当说这是对高等学校的社会职能的新认识和新发展。引领社会变革的高等教育,迫切需要能够正确引导高等教育发展的高等教育发展理论,高等教育发展理论也是通过引导高等教育发展,进而来引领社会变革。其中一个典型案例是印度的“人才外储”的高等教育发展理论,正是在这一发展理论的引导下,印度实施大力发展高等教育的战略,尤其是加强信息产业的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从而有效地引领了印度产业转型升级和高科技产业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就是怎么样使高校培养出来的大学毕业生不仅仅是现有工作岗位的“求职者”,而且是成为未来工作岗位的“创造者”,这就有赖于高校在人才培养上体现出适应与创新的统一。而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理论着眼于从“求职者”的教育,向“创业者”的教育转变。对高等教育认识的这一重要转变实际上也表征着高等教育发展理论的建构正从单纯的“高等教育适应论”视角向“高等教育引领论”视角转变的趋势。

高等教育发展理论的创新应当避免理论的“依附”,从发展理论的借鉴与移植到“高等教育化”的改造与创新

历史上曾有过三种不同的教育理论建构模式,即“经验—理论”模式、“心理理论—教育理论”模式以及“相关学科理论—教育理论”模式。^②显然,高等教育发展理论应属于第三种模式,即通过对相关学

①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等教育与研究在促进社会变革和发展中的新动力——2009年世界高等教育大会公报》,载《中国高等教育》,2009年,第17期。

② 方展画:《教育理论研究的认识定位问题》,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5年,第2期。

科理论(主要是发展理论)的“借鉴”或“移植”而形成的高等教育发展理论。但“借鉴”或“移植”容易形成“依附”,^①一旦形成“依附”,则成为理论发展的误区。如何避免这一误区,“高等教育化”的改造是必不可少的,这就需要回答这样一个诘问:研究社会发展问题的发展理论,它所确立的理论分析框架,以及与之相关的基本概念或术语等,是否仍适用于高等教育发展问题的研究?比如,不论是现代化理论,还是依附理论或世界体系理论,它们所确立的分析框架诸如“传统——现代”“中心——边陲”“中心——半边陲——边陲”等,以及诸如“先发内生型”“后发外生型”等概念或术语,是否能被合理地运用于对高等教育发展问题的探讨中。对于这一诘问可着重从研究对象和内容与理论分析框架的关系角度来考察。由于研究对象和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理论的分析框架,以及与之相关的概念和术语,这就需要考察运用发展理论所研究的社会发展问题与运用发展理论所研究的高等教育发展问题之间的关系。由于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地区)的社会发展与高等教育发展的关系不尽相同,因而有必要从时间和国(地)别这两个维度及其相关角度来考察社会发展与高等教育发展的关系。我们把对于这一关系的考察先置于社会发展与教育发展这一更大的关系范畴来进行。众所周知,教育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和发展而产生和发展的,而人类社会发展和教育发展的进程,是由社会发展与教育发展的内在关系规律所决定的。当人类社会进入近现代,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从总体上呈现一种正向互动关系,也就是说教育发展对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社会发展反过来也推动着教育的发展,这也是从教育学原理的角度可以获得的一种认识。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社会发展处在一种什么样的发展状态和水平,教育也必然就处在同样或

① 虽然“借鉴”或“移植”容易形成“依附”,但并不必然。潘懋元教授就认为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理论借鉴、甚至移植了国外高等教育理论,但并不依附,而是走了一条自主发展的道路。〔见:潘懋元等:《依附、借鉴、创新?——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建设之路》,载《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5年,第1期。〕在学科高度综合、交叉发展的当今时代,完全不发生理论与方法借鉴和移植的学科已极其少见,关键在于如何借鉴和移植。

类似的发展状态和水平呢?我们不能草率地得出结论,而必须依据具体的国家和地区的情况,这就需要一种比较教育学(发展教育)的视角。比如,对于早期的后发外生型国家,其教育却可能是后发内生型的,甚至是先发内生型的。德国通常被认为是后发外生型国家,但其教育在相当程度上被认为是先发内生型的。另有研究数据表明教育规模扩大与经济发展之间并无多大联系。^①这一从比较教育学(发展教育)角度获得的结论与从教育学原理角度得出的结论似乎并不一致。这就有一个如何认识和处理普遍与特殊、本质与现象的关系问题,即教育学原理角度的“深度”更多的是揭示教育发展的普遍性,而比较教育学角度的“宽度”则时常反映的是教育发展的特殊性。而特殊性可以是普遍性的个案(通常包括个案归纳出来的普遍性和普遍性演绎出来的个案),也可以是普遍性的例外,虽然这种情况并不多见,但又是值得高度关注的地方。普遍性所反映的通常是教育发展的本质,而作为普遍性以外的特殊性可能有以下两种情形:一是这种特殊性可能是教育发展的一种现象,深究其本质,与普遍性所反映的教育发展的本质并无二致;二是这种特殊性也可能反映的就是教育发展的本质。不论是何种情形,我们都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这正是在教育的发展研究中把教育学原理角度与比较教育学角度相联系、相结合的关键所在,也应是发展理论的“教育化”改造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以上认识对于社会发展与高等教育发展这一关系范畴而言也同样是适合的,只是发展理论的“高等教育化”改造还须充分考虑到研究对象的某些特殊性。

高等教育发展理论在探讨高等教育发展问题尤其是社会发展与高等教育发展的关系时,应从对单一线性关系的关注到对多维非线性关系的注重,力求避免发展理论的传统分析框架或术语运用方面的“简单化倾向”。高等教育作为人类社会活动的产物,“它不同于自然事物之组合那样单纯、机械,可以用化学分析去解释,揭示它的因素构成,社会现象中的事物,其促成它的因素都不是单一的,不是线性因果的

^① Alan Sica and Harland Prechel. National Political-Economic Dependency in the Global Economy and Education Development.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October, 1981.